

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思想及实践*

仇华飞

[摘要]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建立和睦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规范行为的规章准则,是合理解决争端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状态。西方学者提出两种国际秩序观,一是霸权秩序观,二是均势秩序观。前者强调国际体系格局的霸权结构或单极结构,后者强调均势稳定的国际秩序。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国际秩序不同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强调制度和观念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奠定构建规则与规范的国际秩序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5-0079-07

国际秩序体现国际社会的制度和价值构建,国家实力的消长是影响国际秩序演变的权力基础。在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大国关注秩序内机制和政治博弈的变化,机制是否有利于国家克服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大国是将实力转化为强制力还是作为构建社会共识的基础,决定国际秩序转变的方向。国际秩序分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它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1](pp.2-3)}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为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联合国的建立,从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影响半个世纪国际关系,是一种霸权秩序,呈现不公正性、不稳定性等特征。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是制度和价值的构建,面对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既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又有对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把握,提出一系列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促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新理念、新规则、新体制。习近平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

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2](p.324)}

当今世界,各国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星球上共生,是因为存在一个国际社会。这个社会不仅需要权力的支撑,也需要法律、制度、规则等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任何国家,无论其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管理世界,治理国际社会。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2](p.274)}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今天,更应当加强对话与合作,通过国际社会成员的协商,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来治理世界。习近平关于制度规约下的国际秩序超越了以“极”定义格局的思维模式。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理论与实践体现在制度和价值构建两个维度上,背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15ZDC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景是多极化趋势下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为先导,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对发展中国家作出正确义利观的郑重承诺,从“一带一路”战略和行动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等,凸显国际秩序演变时代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中国梦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理念,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理论构建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全球化、多极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且面临人类生存危机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思想对中国外交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具有时代意义。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他强调各国要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梦想,旨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理性协调的和谐安全观、合作共赢的正确义利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

国际共生论有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社会所有行为体的独立性、主体性与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共生性都具有体系结构性,不仅互动、联动,而且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已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这种体系结构性使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直接关联。^[4]

共生理论为研究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理念。习近平有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两者都以合作为本质,以共赢为目标,都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5]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但只要各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层次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6]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21世纪国际秩序稳定至关重要。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可行性,亚洲各种共同体建设的尝试和努力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虽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亚洲各国也曾有过建立共同体的设想及努力,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亚国家联盟、东盟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等。长期以来,东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主义实践,是“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7]中国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动力,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建设、努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经过深思熟虑、诚心实意谋求和平发展的诉求,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8]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存在逻辑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

(二)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周边是中国首要的外交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2](p.297)}“亲诚惠容”的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和文化的精华部分,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特色,体现中国新的国际价值观念。“亲”强调的是亲缘纽带关系,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文缘方面的相通和亲近感;“诚”既有真诚无妄的一面,也包含诚实守信、不欺侮的意味,体现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真诚有信的态度;“惠”强调的是互惠互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容”在承认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实现差异中的和谐共存。这四字箴言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实现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的梦想。^[9]

如何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习近平指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2](pp.297-298)}“亲诚惠容”的理念有助于加强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力—利—义”三位一体的周边外交策略,将“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重点在东南亚方向实现突破。^[10]

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视角分析“亲诚惠容”的理念,这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理念新的解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针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的担心,提出的中国外交活动的标尺。中国将周边国家视为亲密邻居、亲密朋友,强调以诚待人,以诚为本,以诚立身;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不仅要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也注重对方的利益和诉求,使中国的发展造福周边,共享发展福利;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包容不同意见和诉求,在对待彼此之间的争端时宽容以待,展现海纳百川的气度。^[11]“亲诚惠容”的理念体现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基本内涵。

(三)新安全观

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指出:“应该积极倡

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p.354)}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习近平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提出发展是最大安全的思想。^{[2](p.356)}“作为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已经堪称本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如果安全就是发展,中国也就是亚洲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像早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样,‘新安全观’将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普遍原则。”^[12]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科恩(David Cohen)分析说,“威胁中国和本地区安全的不是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是对安全的‘旧的’或‘零和’理解,这种理解鼓励中国的邻国关注这些争端而不是经济增长与一体化的积极事业。根据这种框架,日本和美国的确是亚洲安全的威胁。它们将领土争端看作中心问题,向中国的东南亚邻国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它们鼓励这些国家挑战中国,而不是关注中国崛起的积极方面”。^[12]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东盟国家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关,由于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13]新安全观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关系走出安全困境,寻求构建促使中国—东盟安全与合作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有效机制。

新安全观思想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传统亚欧大陆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存在张力的历史不再主导欧亚区域间的地缘政

治安排。新安全观深入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个层面,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环境、能源、粮食、反恐等各个议题领域。安全治理需要借助多边的和多层次的国际制度实现全球联动,从而达到合作治理的目的。中欧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有亚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这些跨区域治理组织和制度的存在证明了并非只有通过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相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联盟才能用权威的手段处理全球性问题,不同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国际机制来应对全球性问题。^[14]

新安全观涉及以下领域: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新安全观与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安全与发展: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与金砖国家合作;“新丝路”建设中的安全合作:挑战与应对;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周边安全六大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以及中等强国对中国周边外交及总体安全观的意义。^①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它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亚洲各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从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实践

(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多极化时代人类面临各种挑战,各国需要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利益协调和合作,尤其要加快建立全球治理机制。2015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阐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强调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积

极利用多边机制和国际舞台来寻求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的全球治理观和全球治理战略,这是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新拓展。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的战略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外交与安全领域。

在政治领域,习近平强调,坚持平等民主、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2](p.323)}深化发展中国家间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15]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15]

在经济领域,习近平主张,以创新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巩固金砖国家在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主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p.328)}他敦促金砖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加快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携手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为了亚太地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

^①参见张蕴岭、袁正清:《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来。要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在外交与安全领域,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以中国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16]推进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加强务实合作促进共赢。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强调,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是核能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世界秩序的重要环节。^[17]

关于国际机制创新,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15]

(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的重要实践。当代世界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一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权力分配方面的多极化,而且是发展模式多极化;二是新兴国家地位上升,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国际领导力正在提升;三是非传统安全对当代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权力转变的特征。习近平精辟地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内涵。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不少人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最重要的特征是霸权国家缺少一个重要的战略对手及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平衡。^{[11](p.199)}这是冷战思维模式,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对这

种思维模式的否定。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18]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真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例,习近平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p.279)}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认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是避免美中两国发生冲突,两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美国和中国需要共同承担这个任务。以一方作出所有妥协或单独承认其路线的错误为前提的建议不会取得成功”。^[19]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方针,以避免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的危险。

习近平借鉴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经验和教训,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针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他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0]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对传统大国关系理论的批判和扬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首先实现和维持战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新型大国才能相互尊重,并寻求互利共赢。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在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高层议程中,可以把着眼点放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21]

中美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两国来说都至关重要。美国学者保罗·曼奇内利指出:中美都承认,两国关系不稳定可能导致冲突,而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这种结果。^{[22](pp.12-16)}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具体措施有:第一,美中需要加倍努力谈判减少海上风险的措施;第二,美中需要遏制核扩散威胁;第三,美中

应巩固战略对话,找到限制战略竞争的新途径,包括在网络空间或外层空间领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第一,中美对国际责任的看法不同;第二,双方自我认知不同;第三,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障碍;第四,两国军力不平衡。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合作性安全框架,为解决最严重的人类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对美国、中国以及有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的其他国家来说,答案必须包括推行新的领导形式,深化彼此间的合作,以共同安全为国家安全的检验标准。^[23]上述四个障碍考验中美两国领导人解决矛盾和对立的政治智慧。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行动

“一带一路”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为了使中国和亚非欧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且提出合作的具体措施——“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2](pp.289-290)}关于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指出,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他强调四个“共”,即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p.293)}“一带一路”首要的任务是打通亚洲腹地和加强海上联系来推动亚洲一体化。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借鉴当今区域一体化模式,积极探讨符合亚洲实际、有利于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合作模式。因为无论“一带一路”是作为中国崛起的引擎,还是作为亚洲腾飞的翅膀,都需要依靠沿线各国的积极参与和互动才能真正推动亚洲一体化迈向深入。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国际秩序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作为中国战略性倡议和国际合作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既面临着全方位开放机遇、周边外交机遇、地区合作机遇、全球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道德风险。它既超越古代,又超越近代,具体体现在:一是理念革新:共商、共建、共享;二是理论创新:经济发展理

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三是方式革新:尤其是提出“五体”——文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了“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的主旋律。

“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涵,它为共建繁荣亚洲的良好愿景注入强劲动力。在东北亚,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东南亚,中国与印尼同意加快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中新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已经敲定,中老、中泰铁路开工在即,中越铁路线路正在加紧规划,各国期待已久的泛亚铁路网建设终于迈开步伐。在南亚,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合作,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图进一步明晰,一大批重要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24]除了“一带一路”战略外,中国还在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推动中国与东盟一体化进程、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等方面全面展开。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战略已经初见成效。

三、结语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对强权政治、坚持和平正义的思想,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与时俱进的时代观,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运用到构建中国

特色国际秩序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集中体现；是“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思想的典范，是弘扬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与借鉴：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途径；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权力、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思想的有力批判。同时，也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某些积极要素，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重制度、强调国际合作和国际规则的观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参考文献]

[1]G. John Ikenberry.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4]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J].国际观察,2014,(1).
 [5]王毅.习近平外交理念:具有高超娴熟的外交艺术[N].人民日报,2015-02-12.
 [6]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求是,2013,(4).
 [7]刘宗义.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J].国际问题研究,2015,(4).
 [8]万鹏.习近平 2015 外交大布局:定位中国角色,推出中国方案[EB/OL]. <http://epc.people.com.cn/xuexi/n1/2015/1225/c385474-27974814.html>.
 [9]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J].国际问题研究,2014,(3).

[10]卢光盛,许利平.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新理念及其实践[J].国际关系研究,2015,(4).
 [11]孙云飞.中国周边外交调整的预期目标与大国反应——兼论中国周边外交调整的突破口[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4).
 [12]David Cohen.A Clash of Security Concept: China's Effort to Redefine Security [J].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Vol. XIV, Issue 11, June 4, 2014.
 [13]张哲馨.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J].国际展望,2014,(3).
 [14]任琳.新安全观视野下的中欧关系[J].德国研究,2015,(1).
 [1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16]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4-09-19.
 [17]习近平.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04-03.
 [18]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J].国际问题研究,2013,(3).
 [19]David 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J]. China-U.S. Focus, Hong Kong, September 21, 2013.
 [20]习近平在西雅图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EB/OL].http://news.china.com.cn/2015-09/23/content_36658792.htm.
 [21]达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7).
 [22]Paul Mancinelli.Conceptualizing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J].China Brief Volume: 14 Issue 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May 7, 2014, pp. 12-16.
 [23]Melvin Gurtov.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J].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Issue 52, No.1, Dec. 30, 2013.
 [24]吕鸿,莽九晨,王慧.大格局 大手笔 大胸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球覆盖述评[N].人民日报,2016-01-26.

责任编辑:寒江

and advantages deeply rooted. We shall avoid sheer influx of capitals, the loss of national assets throughout ownership structure modification, and the damage to SOE kerne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ourse of vitalizing capitals in stock. (Zheng You-gui)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ilemma in China's Law Construction: The double dilemmas of China's law constru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internal link among our perspective on power, rights,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hip and rule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ir subsequential rule system. We have taken on enormous efforts to rid of barriers of traditions and modernize rule of law. However, our steps towards running the state according to law are increasingly heavy, discourag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s, social transform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of power centralization, the debility of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The ongoing critical measures for China's law construction lie in our inheritance and upholding of virtuous traditions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obvious regional features to manifest the merits of socialist institution. (Zhang Fu-gang)

The Justice of Land Ownership and Its Realistic Reflections: An Alert to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revolution on land ownership is one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practices of social revolutions in Chinese rural areas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abolishment of feudalism law and order o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the equality 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wakened farmers to the awareness and initiative of challenging the obsolete ideolog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become self-involving participants of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 With the wide-spread campaign o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ommonly-acknowledged public ownership of land, the historical critics about feudalistic land ownership and the revolutions on land ownership institution have been generally completed since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ically justifiable land ownership institution came into being. Admst the market economy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ing context,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since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would always be in the grip of the people as long as we hold fast to Marxism criticism and justice of socialism in policy-making, although historical nihilists, who vilify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and challenge public ownership, have long harbored illusions of revitalizing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Bao Da-wei)

The Disruptive Impact, Causes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of Rampant Fly-Style Corruption: Voraciously rampant 'fly-style' corruption refers to the corruptive acts of grass-rooted officials and cadres who abuse public power or public resource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positions. The detrimental impacts of 'fly-style' corruption are numerous, ranging from jeopardizing cadre-masses relationship, disrupting grass-rooted democracy, stimulating gregarious embezzlement and avaricious corruption, ruining political ecology, imperiling people's interest, causing public assets waste, to disturbing market economy orders. The chief causes of 'fly-style' corruption are as followed: the insufficiency in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the stimulus from materialistic desires, the interference originating from differentiated patterns, the current anemia mechanisms, and the relatively mild penalties. At present, following preventive strategies could be taken against 'fly-style' corruption. we could shore up the Party construction to elevate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improve the system by optimizing managing mechanisms, cut down corruption through intensified supervision, enhance penalties in a constant manner, and raise the mass consciousness by encouraging their participation. (Peng Long-fu)

Chinese Preliminary Advocacy for Propell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Significant Impact: The initiative on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stands for a significant sign of China's continually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China's advocacy for propelling global governance embodies four aspects: firstly, to uphold international orders and system by following the *UN Charter* and to safeguard the openness of world economy institution; secondly, to revolutioniz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new world developmen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the vast majority; thirdly, to innovate more rational and justifiable institutions for better dealing with great challenges confronting human beings; fourthly, to complete the current system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emerging countrie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ocial activities suggests that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co-consult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co-sharing,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rightful idea of moral and profit expand the converging points of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Zhang You-wen)

On Xi Jinping'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order refers to an ideal mode for establish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t is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oexistence, the codes for standard behavior, an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and orderly state for handling conflicts and disputes rationally as well as launch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earch of common development. Western scholars propose two kinds of percep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ders, one is built on hegemony while the other on power balance. The former stresses the hegemonic or uni-polar structure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by President Xi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 and conception,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rule and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Qiu Hua-fei)

Researches and Studies on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Literature Review: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circles came to focus on discourse system studies as Chinese comprehensive powers are increasingly improving. Generally, the researches are mainly carried out in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nnotations of discourse system and related concept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classific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s, the essence of the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xisting crux in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and its underlying causes, the plan for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discourse could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following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studies. (Qian Rong-de)

(翻译:张剑锋)